

# 银税互动、利益共享与财政可持续

姜旭<sup>1</sup> 金成晓<sup>2</sup>

(1.常州大学,江苏 213159;2.吉林大学,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银税互动政策通过财税部门与金融部门间的协同合作,运用市场化金融手段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是近年来财税金融领域的一项创新性举措。财税部门通过与金融机构共享纳税信息,能够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支持并共享发展利益,从而提升税收收入。因此,从财政可持续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银税互动政策的作用,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包含银税互动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从财政可持续视角对银税互动政策效果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银税互动政策通过财税部门与金融机构及企业间的良性互动,对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具有积极作用;银税互动政策在经济状况恶化条件下具有相对较强的逆周期调节能力;在促进财政可持续性方面,银税互动政策与减税降费政策具有一定互补性。

**关键词:**银税互动 财政可持续性 信用信息共享 小微企业融资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3)11-0031-11

##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升财税金融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着力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我国陆续实施了一系列税费减免和普惠小微信贷支持政策。财税和金融领域各部门的政策协同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复苏和高质量发展。其中,国家税务总局于2015年推出的银税互动政策极具特色,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其通过税务部门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推动小微企业良性发展,实现小

微企业、金融、税务三方共赢,成为近年来减税降费与普惠金融领域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随着政策的不断实施和深化,银税互动政策发展迅速,不仅支持对象逐渐从纳税信用A级拓宽至B、M乃至C级,业务申请和审批流程也不断优化。结合“春雨润苗”专项行动,仅2023年上半年,我国小微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银税互动信贷投放近500万笔,数额近1.5万亿元。

在此背景下,银税互动政策为我国的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点。一方面,银税互动政策不同于一般的减税降费或财政补贴,其在支持小

[收稿日期]2023-10-23

[作者简介]姜旭,吴敬琏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金融和普惠金融;金成晓,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计量分析。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银税互动政策的双向耦合与风险共担机制研究”(2023SJYB1280);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期共同富裕方向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22JJD790021)。

微企业的过程中只向金融机构提供企业纳税信息，并不涉及财政收支，但未来却可以通过小微企业的良好发展增加税收。另一方面，银税互动政策能够提升小微企业纳税的积极性和规范性，有助于培育优质税源，同样能够为未来的财政可持续性提供有效支撑。因此，财税部门通过银税互动，实际上共享了小微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发展利益。与此同时，银税互动虽然能够帮助商业银行遴选优质企业，规避小微企业合格抵押品不足的问题，但纳税信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机融入到商业银行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中，尚有待进一步观察。特别地，高风险性是小微企业客观存在的特征，加上商业银行面临的普惠小微信贷投放考核压力，可能导致企业过度借贷而引发道德风险。这对于同质化竞争较强的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而言，影响会更加明显。由于这些风险可能对财政产生影响，因此，银税互动政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作用和效果尚不明确。

现有研究对于银税互动政策的讨论主要围绕理论机制分析、政策现状研判和技术应用论证等角度展开。一是理论机制分析方面。杨龙见等(2021)利用微观数据进行了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风险小、贷款记录少、信用等级高的企业，更容易通过银税互动获取信贷支持。陈彪等(2021)基于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纳税额度和银行信贷政策取向是影响银税互动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且宽松的信贷政策会激发企业诚信纳税的积极性。罗鹏飞等(2022)利用结构化模型和实物期权方法的研究则发现，企业波动率是银行信贷政策取向的主要依据。二是政策现状研判方面。既有研究认为信息共享程度低、征信互认难度大、协同治理同步差是银税互动政策面临

的主要挑战(陈果和陈文裕,2017)，现阶段银税互动政策在工作协调机制、共享信息范围、纳税信息共享方式、信贷产品设计、宣传推广细节等五个方面，都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西晓楠,2023)。三是技术应用论证方面。部分研究围绕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在银税互动政策设计与实施过程中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策略进行了讨论(安然和杨雷鸣,2021；王水莲等,2022)，并使用机器学习等方法考察了纳税数据对小微企业信贷风险的识别能力(李超杰,2022)。

此外，财税与金融部门还通过银税互动之外的其他措施协同支持企业发展，虽然合作内容和作用机制与银税互动政策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政策搭配、目标侧重、协同优势、潜在成效等方面有相关性，因此，相关文献也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第一，两者的协同合作能够在支持企业发展方面形成政策合力。财政政策能够在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民间性金融等三个层次起到引导作用，并借助与金融的协同提升政策支持的市场化与可持续性(王伟和孙永涛,2022)。当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过程中加入税收信息时，有利于提升政策直达性和有效性，财税与金融政策间的协同能够为宏观金融调控拓宽空间(刘冲和刘莉亚,2022)。第二，两者的协同合作对于风险的联防联控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为财政与金融风险的混合体，需要财政和金融部门共同防范(郭传辉,2022)。另一方面，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间的不当搭配可能是放大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杨倩等,2022)。

总体而言，既有文献较为全面地分析了银税互动政策的理论机制和实施现状。然而，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负债水平较高、积极的财政政策亟须提升效

能的背景下,有必要从财政可持续性的角度对银税互动政策的效果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事实上,基于财政可持续的整体性视角,有助于综合考察财税、金融、企业三方共赢的综合成效,从而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对银税互动政策的机制和效果进行分析,避免政策评价囿于单一视角。这对于进一步完善和优化银税互动政策,并增强其与其他政策间的协同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基于DSGE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描述模型的基本设定,对估计结果与数值进行模拟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 二、理论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BGG金融加速器机制,构建了一个包含财税政策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通过在银行与企业间的信贷决策中加入企业纳税信息因素,向模型中嵌入了银税互动机制。模型包含家庭部门、企业部门、财税部门与货币政策当局等四个主要部门,其中企业部门包括中间品厂商、最终品厂商、企业家,以及包含银税互动机制的银行信贷决策过程。

### (一)家庭部门

模型中的代表性家庭部门具有一个加性可分形式的效用函数:

$$U(c_t, h_t) = E_0 \sum_{t=0}^{\infty} \beta^t (\log c_t - \frac{\xi h_t^{1+\eta}}{1+\eta}) \quad (1)$$

式(1)中,  $c_t$  和  $h_t$  分别为消费和劳动,  $\beta$  为效用贴现因子,  $\xi$  衡量了家庭对于闲暇的偏好,  $\eta$  为劳动供给的 Frisch 弹性。家庭部门的预算约束为:

$$c_t + d_t = (1 - \tau_h) w_t h_t + \frac{d_{t+1}}{\pi_t} (1 + r_{t+1}) + X_t \quad (2)$$

式(2)中,  $d_t$ 、 $w_t$ 、 $r_t$  分别为存款、工资水平、利率,  $X_t$  为家庭作为企业部门的所有者取得的利润,  $\pi_t = P_t /$

$P_{t-1}$  为通货膨胀率。  $\tau_h$  为所得税率, 财税部门征收的所得税  $tax'_h = \tau_h w_t h_t$ 。为简便起见, 后文中将省略所有  $t+1$  期变量带有的期望算子。在上述预算约束下, 最大化家庭部门效用函数所得到的一阶条件为:

$$(1+r_t) = \frac{1}{\beta} \frac{c_{t+1}}{c_t} + \pi_{t+1} \quad (3)$$

$$(1-\tau_h)w_t = \xi c_t h_t^\eta \quad (4)$$

### (二)企业部门

企业部门的建模基于经典的BGG金融加速器机制设定, 为简便起见, 本文将 Christiano et al. (2014)等经典文献中的中间品厂商、最终品厂商、企业家和完全竞争的银行部门合并为企业部门, 并重点介绍在BGG机制基础上嵌入的银税互动机制, 其余部分则仅作必要描述, 可参考 Christiano et al. (2014)。具体地, 垄断竞争的中间品厂商可进行利润最大化决策, 其利润  $\Pi_t^p$  为:

$$\Pi_t^p = E_0 \sum_{i=0}^{\infty} A_{0,t} \left( \frac{P_t(i) y_t(i)}{P_t} - w_t h_t(i) + r_t^k k_{t-1}(i) \right) \quad (5)$$

其中,  $A_{0,t}$  为随机贴现因子,  $y_t(i)$ 、 $P_t(i)$  为第  $i$  个中间品厂商利用资本  $k_{t-1}(i)$  和劳动  $h_t(i)$  所生产的中间品的数量和价格,  $r_t^k$  为资本回报率。中间品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即  $y_t(i) = A_t h_t(i)^{1-\theta} k_{t-1}(i)^\theta$ , 其中  $A_t$  为 AR(1)形式的技术冲击,  $\theta$  衡量资本在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与标准的 Calvo 价格粘性设置相一致, 假设中间品厂商以  $\alpha$  概率使用上期的  $P_{t-1}$  进行定价。中间品在完成生产后, 将由最终品厂商利用 Dixit-Stiglitz 技术加总为最终产出:

$$y_t = \left( \int_0^1 y_t(i)^{\frac{\psi-1}{\psi}} di \right)^{\frac{\psi}{\psi-1}} \quad (6)$$

求解最终品厂商与中间品厂商的最优化问题, 可得到价格决定方程。生产中所投入的资本来自企

## 专题策划：财政可持续

企业家,在每期,企业家将通过内外部融资来进行投资决策,即  $q_k k_t = n_t + b_t$ , 其中,内部融资  $n_t$  为企业家净资产,外部融资  $b_t$  为银行信贷,  $q_t$  为资本的相对价格,  $q_k k_t$  为总资产。因此,企业家的杠杆率为  $lev_t = q_k k_t / n_t$ 。

资本  $k_t$  与新增投资  $i_t$  间的关系为  $k_t = (1-\delta)k_{t-1} + i_t + \frac{\phi}{2} \left( \frac{i_t}{k_{t-1}} - \delta \right)^2 k_{t-1}$ , 式中最后一项为资本的调整成本,  $\delta$  为折旧率。

与经典 BGG 机制一致,企业家在投资时会面临一个期望为 1 且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异质性风险冲击  $\omega_t$ , 在此风险的作用下,企业家将有一定概率无法偿还银行贷款  $b_t$ , 此时银行将回收企业家全部剩余资产。由于  $\omega_t$  的期望为 1, 所以,企业家基于预期的投资决策不会考虑风险问题, 其预期回报率  $R_{t+1}^K$  为:

$$R_{t+1}^K = \frac{(1-\tau_k)r_{t+1}^k + (1-\delta)q_{t+1}}{q_t} \pi_{t+1} \quad (7)$$

其中,  $\tau_k$  为企业所得税率, 财税部门征收的企业税负  $tax_t^k = \tau_k q_k k_t$ 。由于异质性风险  $\omega_t$  无法被银行观测, 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在投放贷款时, 会要求企业家支付额外的风险溢价  $sp_t$ , 其数值为内外部融资的跨期成本之比, 即  $sp_t = \pi_{t+1} R_{t+1}^K / (1+r_t)$ 。在经典 BGG 金融加速器机制中, 企业家杠杆率与风险溢价正相关, 即  $p(lev_t)$  的一阶导数大于零。

在上述机制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引入银税互动政策和金融风险冲击。其中, 银税互动政策变量设定为  $\tau_t = (tax_t^k / tax_{t-1}^k)^{\phi_r}$ , 其大小与企业纳税情况有关,  $\phi_r$  为调节参数。这一设定刻画了银行授信额度与企业纳税额度之间的正相关性 (Luo et al., 2020)。若企业缴纳的税收相比上一期有所上升, 此时  $\tau_t > 1$ ,

反映出企业经营情况持续向好。金融风险冲击  $\nu_t$  则服从 AR(1) 过程。银税互动政策、金融风险, 以及企业杠杆率共同构成了银行信贷风险溢价的三个影响因素:

$$sp_t = \frac{p(lev_t)\nu_t}{\tau_t} \quad (8)$$

从式(8)中可以看到, 金融风险冲击  $\nu_t$  对于风险溢价具有放大作用, 而银税互动变量  $\tau_t$  则能够降低风险溢价。需要注意的是, 与企业家杠杆率  $p(lev_t)$  和风险溢价间的内生关系不同, 银税互动和金融风险冲击均为外生形式。前者的内生关系意味着银行在进行信贷投放最优化决策时主要参考杠杆率  $lev_t$ , 本质上是以企业家总资产作为抵押而发放的抵押贷款, 在企业家遭受异质性风险而无力偿还贷款时进行破产清算, 因此, 其最优决策仍遵循收益覆盖风险的市场化原则。与之相对, 银税互动变量则以外生形式出现, 因为企业纳税记录虽能反映企业经营情况, 但银行并未掌握这一信息, 因此, 在方程中体现为外生影响。当然, 所谓外生仅指银税互动规则的引入形式为外生,  $\tau_t$  本身仍作为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内生变量, 并内生地参与到整个模型系统的运行中。上述设置能够较为简洁地将银税互动政策嵌入至 BGG 金融加速器机制中。

在基准模型中, 本文先将银税互动调节参数  $\phi_r$  设置为零, 此时  $\tau_t$  的取值恒为 1, 模型退化为不包含银税互动政策。在此条件下完成基准模型的参数估计, 以得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结果。之后再设置银税互动与减税政策等反事实情形, 进行机制分析和效果比较。

### (三) 财税部门

财税部门通过对家庭部门征收所得税  $tax_t^h$ 、对

企业部门征收企业税  $tax_t^k$ 、新增政府债务  $bg_t$ ，存在政府支出  $g_t$  的情况下维持财政平衡：

$$bg_t + tax_t^h + tax_t^k = g_t + (1+r_t)bg_{t-1} \quad (9)$$

政府支出则遵循以下规则：

$$\frac{g_t}{g} = \left(\frac{g_{t-1}}{g}\right)^{\rho_g} \left[\left(\frac{y_t}{y}\right)^{\phi_g} \left(\frac{bg_t}{bg}\right)^{\phi_{bg}}\right]^{1-\rho_g} e^{\mu_g} \quad (10)$$

其中，不带时间下标  $t$  的变量代表相应变量的稳态值， $\mu_g$  为财政支出冲击。

#### (四)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遵循泰勒规则，形式与参数含义和政府支出规则较为类似：

$$\frac{1+r_t}{1+r} = \left(\frac{1+r_{t-1}}{1+r}\right)^{\rho_r} \left[\left(\frac{y_t}{y}\right)^{\phi_r} \left(\frac{\pi_t}{\pi}\right)^{\phi_\pi}\right]^{1-\rho_r} e^{\mu_r} \quad (11)$$

此外，模型中的总产出资源约束为：

$$y_t = c_t + i_t + g_t + \frac{\phi}{2} \left(\frac{i_t}{k_{t-1}} - \delta\right)^2 k_{t-1} \quad (12)$$

### 三、数值模拟分析

#### (一) 参数校准与估计结果

本文遵循国内 DSGE 文献中的惯例，将家庭贴现因子  $\beta$  校准为 0.99，通货膨胀的稳态值按年化 3% 的水平校准为 1.0074 (马勇和姚驰, 2022; 马勇和章洪铭, 2023)，其余参数则通过贝叶斯估计的后验均值进行校准。由于基准模型中包含 4 个冲击，故在估计中可选取不多于 4 个可观测变量。利用 2013 年第 1 季度至 2023 年第 3 季度的实际 GDP、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CPI、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 (Shibor) 利率作为  $y_t, i_t, \pi_t, r_t$  的可观测变量数据。所使用数据来源于同花顺中国经济 (EDBC) 数据库，其中实际数据均通过 GDP 平减指数进行转换得到，并对数据进行 X12 季节调整和单边 HP 滤波去趋势处理。完整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

参数	定义	先验分布	后验均值	90%置信区间
$\eta$	劳动的逆弹性	B[0.30, 0.10]	0.4101	[0.3486, 0.4758]
$\theta$	资本在生产中所占份额	B[0.50, 0.10]	0.5169	[0.5033, 0.5326]
$\alpha$	通货膨胀粘性参数	B[0.75, 0.10]	0.7642	[0.7180, 0.8079]
$\phi$	资本调整成本参数	G[2.80, 1.00]	1.5130	[0.8055, 2.2946]
$\psi$	中间品替代弹性	G[6.00, 1.00]	7.0743	[5.8977, 8.2247]
$\delta$	资本折旧率	B[0.025, 0.01]	0.0269	[0.0249, 0.0288]
$\tau_n$	家庭部门所得税率	B[0.08, 0.02]	0.0697	[0.0569, 0.0801]
$\tau_k$	企业部门企业税率	B[0.20, 0.05]	0.2002	[0.1755, 0.2281]
$\rho_r$	货币政策规则惯性系数	B[0.70, 0.10]	0.6801	[0.6006, 0.7582]
$\phi_\pi$	货币政策规则通胀反应系数	G[1.50, 0.10]	1.7147	[1.6110, 1.8175]
$\phi_y$	货币政策规则产出反应系数	B[0.50, 0.10]	0.2344	[0.1763, 0.2873]

表 1 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

参数	定义	先验分布	后验均值	90%置信区间
$\rho_g$	财政支出规则惯性系数	B[0.50,0.10]	0.4476	[0.3718,0.5130]
$\phi_g$	财政支出规则产出反应系数	N[0,0.10]	0.0553	[-0.0031,0.1114]
$\phi_{bg}$	财政支出规则债务反应系数	N[0,0.10]	-0.0276	[-0.0903,0.040]
$\rho_A$	技术冲击 AR(1)系数	B[0.75,0.05]	0.6793	[0.6175,0.7305]
$\rho_r$	风险冲击 AR(1)系数	B[0.75,0.05]	0.6965	[0.6693,0.7293]
$\mu_m$	货币政策冲击标准差	IG[0.01,Inf]	0.0228	[0.0181,0.0279]
$\mu_g$	财政支出冲击标准差	IG[0.01,Inf]	0.0198	[0.0156,0.0242]
$\mu_A$	技术冲击标准差	IG[0.01,Inf]	0.0044	[0.0034,0.0054]
$\mu_r$	风险冲击标准差	IG[0.01,Inf]	0.4185	[0.2840,0.5399]

注：B、G、N、IG 分别表示 Beta 分布、Gamma 分布、正态分布、逆 Gamma 分布。

在后文的数值模拟分析中,将使用表 1 中的贝叶斯后验均值,对相关参数进行重新校准,以便使模拟结果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数据。

## (二)脉冲响应分析

### 1.银税互动政策的短期影响路径

在基准模型的校准中,为了更好地进行贝叶斯估计,前文曾将银税互动调节参数校准为零,此时银税互动变量  $\tau_t$  固定为 1,因而在基准模型中不存在银税互动机制。为了验证银税互动政策的短期传导路径,本文将银税互动调节参数设置为 0.5,此时银税互动变量  $\tau_t$  与企业税收同方向变动。进一步地,本文在式中加入外生冲击项  $\mu_r$ :

$$\tau_t = (\tau_t^k / \tau_{t-1}^k)^{\phi_r} e^{\mu_r} \quad (13)$$

利用短期冲击,可以考察银税互动政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短期影响路径。图 1 展示了在 1% 大小的正向  $\mu_r$  冲击下,企业贷款、信贷利率、企业税收以

及政府债务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中横轴为期数,纵轴表示各变量的百分变化或与稳态水平的相对偏离。如图 1 所示,由于银税互动政策的引入,商业银行在传统的抵押贷款方式之外,还额外获取了能够衡量企业经营情况的纳税信息,从而有意愿投放更多的信贷以对企业形成支持,这使得企业抵押品不足的约束得到充分缓解,表现为图 1(a)企业贷款  $b$  的脉冲响应为正,且具有平缓的收敛趋势。由于本文以外生方式对银税互动政策进行建模,故图 1(b)中的信贷利率  $Rb$  仅在冲击当期出现短暂下降。这一结果也暗示,若商业银行仍采取以抵押担保为主的传统信贷决策方式,则银税互动政策提供的“纳税信用”将不能完全等同于“融资信用”,前者仅能影响信贷额度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而无法像后者一样利用市场化定价手段解决企业的“融资贵”问题。

从图 1(c)企业税收和图 1(d)政府债务的脉冲响应结果中可以看到,银税互动政策的实施对于财政可持续性产生了明显的正向影响。企业通过银税互动政策获取更多贷款后,至少可能通过三个途径对财政可持续产生影响:第一,在缓解融资约束之后,企业会相应地采取更为积极的增资扩产行为,而更高的增长前景会增加未来的税收收入。第二,由于纳税记录对于企业贷款形成了正向激励,因而企业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会考虑增加纳税以便获取更多贷款是否对自身更加有利,这种权衡在形成正向增长效应的同时,会持续改善财税部门的企业税收收入。第三,持续向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减少了对逆周期财政扩张的依赖,通过削减赤字能使财政更快地恢复平衡。在上述途径中,财税部门通过无成本的银税互动政策,共享了企业的发展成果。最终,政

府债务  $b_g$  在银税互动政策的上述影响路径下,呈现出明显且持续的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税收的脉冲响应结果在经历了短期上升之后长期处于 0 以下,如图 1 (c)所示。这是因为图 1 是基于短期冲击得到的脉冲响应结果,此时银税互动政策仅起到一次性作用,虽然企业信贷具有连续性、在一次性冲击下会持续一段时间才收敛为零,但一次性的信贷增加更容易催生投机行为。在本文具有异质性风险的 BGG 机制下,企业的加杠杆行为将面临更高的破产风险,因此在失去持续信贷支持的情况下,企业更容易遭受损失。这也提醒我们,相比于银税互动政策的短期效果,只有长期的持续支持才能真正惠及企业,进而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影响,临时性支持可能会将金融领域的信贷风险经由实体经济部门转嫁至财政部门兜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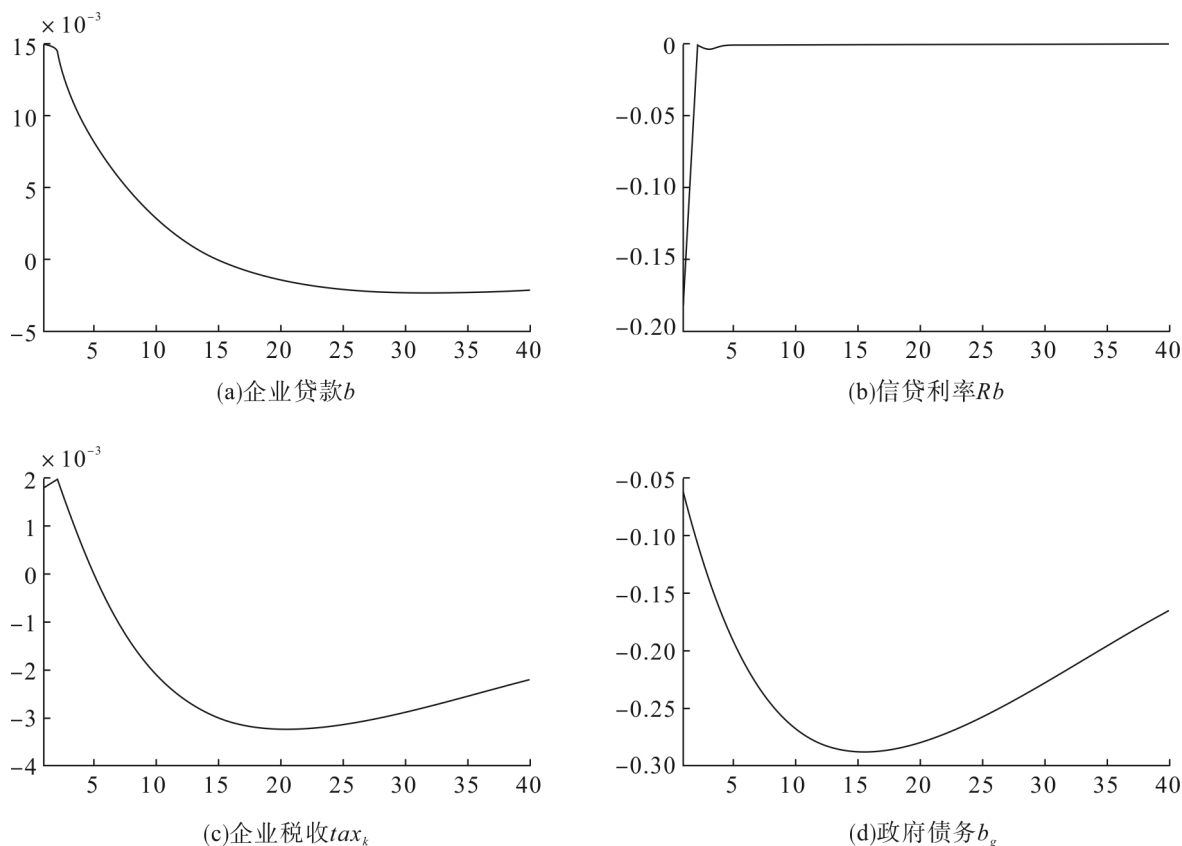


图 1 银税互动政策冲击的短期影响

## 2. 银税互动政策的反事实模拟分析

如前文所述,虽然通过直接增加外生冲击得到的脉冲响应有助于判别政策的影响路径,但这种考察仅适用于短期情形,无法考察长期实施银税互动政策的实际效果。有鉴于此,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设置了三种情形进行反事实机制分析:(1)银税互动: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不包含冲击项的银税互动变量,即  $\tau_i = (\text{tax}_i^k / \text{tax}_{i-1}^k)^{\phi_\tau}$ ; (2)减税降费:在校准时,将企业税率  $\tau_i$  下调 20%; (3)在基准模型中,同时加入银税互动和减税降费两种措施。为了相对全面地比较结果,本文考察了三种情形下,各变量对技术和风险两类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具体如图 2 和图 3 所示。与图 1 一样,图中纵坐标表示变量在冲击下相对于稳态的百分比偏离。

图 2 展示了技术冲击下各主要变量的脉冲响应结果。相比银税互动政策,更低的企业税率在面对正向技术冲击时表现得更好,不仅图 2(a)中企业增加信贷和图 2(b)中企业杠杆的幅度更高,而且从图

2(c)政府债务下降程度来看,减税降费情形的财政可持续性也更强。相比之下,包含银税互动政策的两种情形则在技术冲击下表现相对不佳,特别是短期内图 2(d)税收的响应幅度甚至低于减税降费,这一略反直觉的结果背后,可能暗含以下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一方面,正向的技术冲击反映了经济基本面处于持续向好的状态,此时更低的约束会更有利于冲击的传导。银税互动政策由于外生地影响了商业银行和企业间的信贷关系,其在正向技术冲击下的约束程度更高,因此限制了正向技术冲击的作用,这从企业杠杆的脉冲响应结果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包含银税互动政策的两种情形下,曲线变动更加剧烈,较差的平滑程度恰恰说明企业的借贷决策受到了非预期的干扰。此外,企业基于理性决策,在顺周期条件下本身就具有增资拓产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银税互动在“锦上添花”的同时,实际上也提高了企业过度加杠杆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模型参数空间存在约束,故本文在情景设置时没有设计减税降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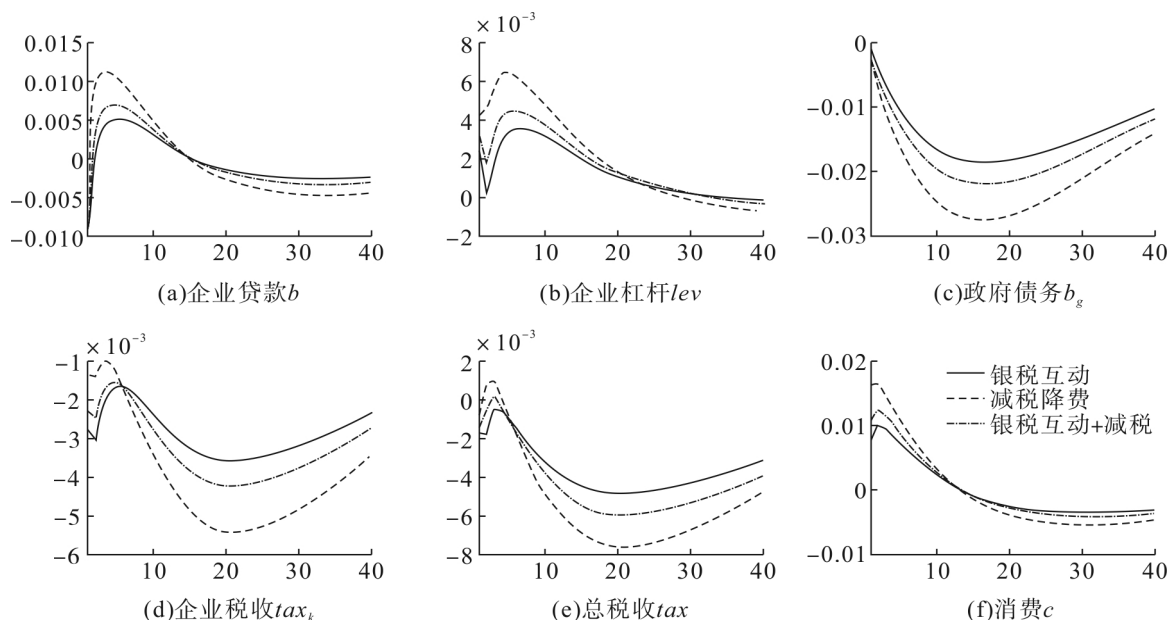


图 2 技术冲击下各情景的脉冲响应结果



政策规则,而是通过改变企业税率的稳态值进行反事实分析,这种设置实际上没有体现财税部门面对冲击时的主动调整功能,而类似自动稳定器的被动式调整机制,在理性预期下更易取得平滑的结果。在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图2中减税降费情形下的脉冲响应曲线波动范围更大。但总体上,图2反映出在利好经济的正向技术冲击情形下,银税互动政策的效果不够理想。

图3展示了风险冲击下各主要变量的脉冲响应结果。与图2不同的是,在这一反映经济状况不佳

的情形下,包含银税互动政策的两种情形得到了更加稳定的脉冲响应曲线。特别是图3(a)和图3(b)中的企业贷款和企业杠杆两个变量,当风险冲击推高了风险溢价并对企业信贷产生不利影响时,银税互动政策对企业形成了有力支撑,并在短期内对冲了风险。而这种在经济状况不佳条件下,借助信贷而非直接减税的支持方式也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了有利影响,即银税互动政策情形下,图3(c)政府债务的脉冲响应始终处于平缓且较低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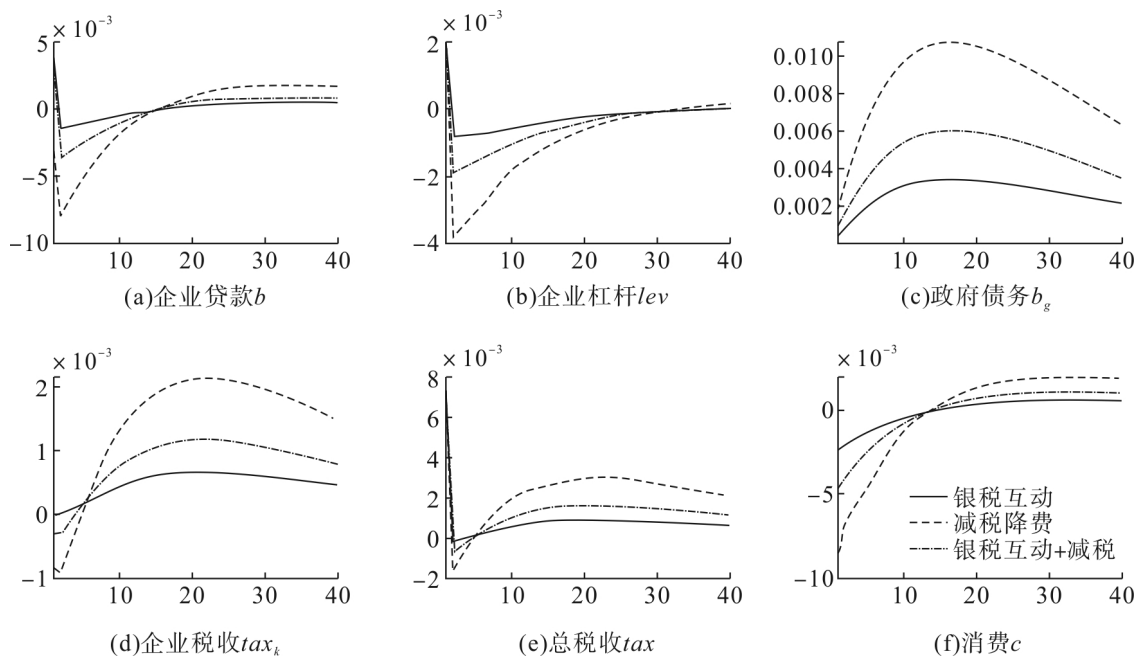


图3 银风险冲击下各情景的脉冲响应结果

此外,结合图2和图3中“银税互动+减税”政策情形,发现脉冲响应图形均处于三种情形的中间位置,不过这一结果在企业和政府债务这两个变量上的解释会有所不同。从企业的角度而言,这一结果表明银税互动政策和减税措施间具有替代效应,因为仅选其一可能取得更好的支持效果。获得税收减免的企业由于缺少了连续的、能够真实反映其经

营状况的纳税信息,将在申请银税互动的信贷支持时面临限制。而从政府债务的角度而言,银税互动政策和减税政策之间则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互补,特别是在经济环境状况不佳、需要对企业进行全面的组合式支持时,两者的合理搭配使用,将有助于缓解单一政策下对于财政可持续性的不利影响。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包含银税互动机制的 DSGE 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系统性地考察了银税互动政策通过改善银企信贷条件,与银行共享企业发展利益的作用机制,以及其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效果。借助政策冲击和分情景反事实模拟的脉冲响应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银税互动政策能够缓解商业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在财税部门不提供税费减免的前提下也可以借助金融体系对企业形成支持,而这种间接支持在拓展金融部门业务的同时,也使税收记录成为对企业的正向激励,最终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第二,与减税降费等措施相比,银税互动政策在经济状况不佳时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而在经济状况相对较好时,作用相对不够显著,因此更适用于逆周期调节。减税降费措施则更适合在顺周期情况下实施。第三,银税互动政策和减税降费措施在支持企业方面具有一定互斥性,但在维持财政可持续性方面则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基于经济状况的合理搭配能够更好地发挥政策效果。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银税互动政策应逐步探索对于小微企业的中长期持续支持机制,规避临时性支持对企业持续融资能力的损伤和对经营决策的干扰。一方面,应进一步发挥财税部门的引导作用,不仅将银税互动政策作为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工具,也要将其作为协助金融部门完善普惠信贷支持体系的重要手段。通过纳税信息缓解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促成两者形成微观上激励相容、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应建立市场化且缓和有序的银税互动政策退出机制。既要避免出于疫情防控期间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以及提高银税互动信贷申请成功率等原因而放宽的要求和鼓励政策

所可能催生的投机行为和道德风险,也要防止信贷支持退出和转向过快造成变相的抽、断贷干扰对企业的资金链和经营决策造成的不利影响。否则两种情况产生的风险,最终都会影响财政可持续性。

第二,应进一步增强银税互动政策与减税降费措施的兼容性和协同性,通过合理搭配形成优势互补,避免政策间出现冲突或过度叠加。一方面,应探索银税互动和减税降费政策间的统筹机制。可以在共享各自支持记录的基础上,依照两者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优势特点,动态地设计组合式支持权重,探索跨周期的梯次支持搭配模式。另一方面,应避免减税降费措施削弱小微企业的银税互动信贷申请资质。对此应进一步强化纳税信息的有效利用率,通过大数据等技术,在纳税额度之外,充分挖掘能够反映小微企业经营健康程度的其他纳税信息指标。最终,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合理搭配,在最大程度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小恶化财政状况。

第三,应借助银税互动政策,加强财税部门特别是地方财税部门与当地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机制。在银税互动政策能够使银、税、企三方利益共享的同时,也应警惕这一新机制下造成的各部门风险共担。其一,应提升财税部门与金融部门间信息共享的互动性,特别是在系统性风险的联防联控方面,不仅让纳税信用为银行信贷提供担保,也可以考虑让融资信用反哺财税部门的财政支持措施,从而通过增强政策支持精准性来减少债务风险集聚。其二,应借助银税互动搭建地方层面的银、税、企信息共享联动平台,帮助地方财税部门和地方性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形成银、税、企三者间的良性互动。其三,在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条件下,也应当适当增加银税互动政策的统一性和规范性,缓解现阶段各

地政策实施细节差别较大的现象,防止个别领域的风险集中暴露。最终,在建设金融强国和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目标下,更好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实现财政、金融、企业的三方共赢。

### 参考文献:

- [1] 安然,杨雷鸣.应用“区块链+银税互动”促进小微企业融资的研究[J].税务研究,2021,(05):122-128.
- [2] 陈彪,罗鹏飞,杨金强.银税互动、融资约束与小微企业投融资[J].经济研究,2021,56(12): 77-93.
- [3] 陈果,陈文裕.协同治理视角下的银税互动[J].税务研究,2017,(02): 117-120.
- [4] 郭传辉.财政金融协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实践与思考[J].地方财政研究,2022(05):56-66.
- [5] 李超杰.基于机器学习的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智能决策系统研究——以“银税互动”政策的共享纳税数据为例[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04):66-74+136.
- [6] 刘冲,刘莉亚.财政金融政策的协同效应——基于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增值税减免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22,(09):67-84+205.
- [7] 罗鹏飞,陈银银,陈彪,等.政府刺激性投资政策下中小微企业银税互动设计及其投融资决策[J].中国管理科学,2022,30(08):12-20.
- [8] 马勇,姚驰.通胀目标调整、政策可信度与宏观调控效应[J].

金融研究,2022(07):1-19.

- [9] 马勇,章洪铭.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传导机制与政策应对[J].中国工业经济,2023,(08):42-60.
- [10] 王水莲,聂婷,蔡幸.数字技术赋能银税互动:机理、制约与策略[J].税务研究,2022,(12): 48-52.
- [11] 王伟,孙永涛.财政金融协同视角下普惠小微金融发展[J].地方财政研究,2022(05):47-55.
- [12] 西晓楠.深化和规范“银税互动”的路径探析——基于湖北省“银税互动”开展情况的调查[J].税务研究,2023,(07):32-38.
- [13] 杨龙见,吴斌珍,李世刚,等.“以税增信”是否有助于小微企业贷款?——来自“银税互动”政策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1,56(07):96-112.
- [14] 杨倩,胡小文,胡昌雄.稳增长—控债务双重目标下减税政策效果及其与货币政策协调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22(05):13-27.
- [15] Christiano L. J, Motto R, Rostagno M. Risk Shock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1): 27-65.
- [16] Luo P, Song D, Chen B.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for SMEs with Bank-tax Interaction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0, (65): 163-172.

【责任编辑 高志鹏】

(上接第 30 页)

- [24] 李贺. 缓解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J]. 宏观经济管理,2023,(08):85-92.
- [25] Burges C. J. C, Smola A. J. Advances in Kernel Methods: Support Vector Learning[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 [26] 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组,张东玲,何洲娥.新常态下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J].公共财政研究,2017,(01): 49-61.
- [27] 马光荣,吕冰洋,窦艺.中国各地区财政发展指数的构建、

测度与评价[J].财经智库,2023,8(02):5-22+138.

- [28] 徐军伟,毛捷,管星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再认识——基于融资平台公司的精准界定和金融势能的视角[J].管理世界,2020,36(09):37-59.
- [29] 郭艳娇,曲世寄,成丹.县区财政可持续与政策空间的度量 and 实证分析——基于×省县区的调研数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3(11):30-40.

【责任编辑 郭艳娇】